2019年5月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ay 2019
第21卷第3期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1 No. 3

参与集体行动还是获得资源：中国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因分析

张 华[1],吕 鹏[2]

(1.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以往的多数研究认为缺乏自主性阻碍了当前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但在行业协会普遍缺乏自主性的情形下,调研数据却显示私营企业加入协会的数量在持续增长。西方理论视角将自主性作为行业协会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一观点很难解释中国情境下的这一矛盾。基于研究转型国家的庇护理论(Clientelism),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机和企业政治关系对加入行业协会的影响。通过对2006—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有政治关系的经济精英加入行业协会的比例更高,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政策解读、与政府沟通和俱乐部服务,而并非行业自律和协调,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获取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的动机大于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

[关键词]行业协会;私营企业;政治关系;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D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3-009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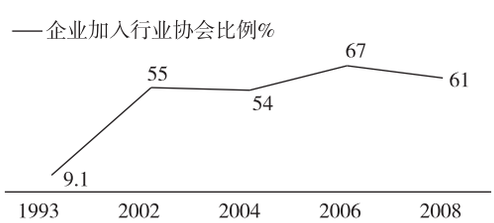
DOI: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19.03.01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当代行业协会的产生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海外政治学对中国企业家的集体行动能力十分关心,私营企业的集体性组织形成是这一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有超过半数私营企业家参加的行业协会,显然是最显著的组织形式。然而很多研究者观察到,虽然数量众多的企业加入了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却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也没有成为代表企业利益的集体组织,甚至成为"二政府"。研究还发现很多协会处于勉强维持的停滞状况[1]。持法团主义理论观点的安戈在新的研究中也发现,由于政府为掌控各种变化而将政策倒置,协会的发展已经停滞[2]。

另一方面,据"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图1)显示,1993年仅有9%的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2002年已经有超过半数的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2006年加入协会的企业更是达到67%,加入行业协会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如果协会没有发挥其核心作用,也没有得到企业的认可,为何还有众多的企业加入行业协会?

以往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的研究借用了西方相关理论的两种观点:公民社会理论的观点认为市



1.数据来源: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2.1995、2000年无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数据

图1 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比例

[基金项目]之江青年课题"中国精英的代际流动研究"(16ZJQN045YB)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华,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商关系、政治态度。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场经济的发展为私营企业主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土壤,法团主义的观点则认为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是行业协会发展的关键。但共同利益聚合在一起的团体是西方理论下发展出来的观念,行业协会作为中介组织和整合方式,其前提是西方社会的发达的民主政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运用到中国时,不能不考虑其整体情景。一些研究指出中国行业协会具有"双重身份"和"半官半民"的性质[3-4],这种双重身份意味着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行业协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理论视角下的职能。

与一些研究者认为行业协会发展障碍是政府过多的干预不同,在2006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中询问"您是否希望由民营企业家担任工商联会长?",有高达65%的企业家的选择是"否"。大部分的企业家宁可选择政府官员兼职或者有政府背景退休的官员任职会长。这表明了行业协会或者工商联等机构的去行政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私营企业主的认可。而2008年和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有一半以上的私营企业主并不认为"制约行业组织健康发展的原因"是"行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和"政府职能转变和转移不到位"。这表示至少有半数的企业家并不认为行业组织独立于政府是协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此外,为了行业协会的发展,近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政府组建的行业协会去行政化的努力,并从2007年开始加大力度。200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商会兼任领导职务,并要求行业协会要从职能、机构、工作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政府及其部门、企事业单位彻底分开,要求合署办公的限期分开①。这一去行政化的政策也被称为"脱钩"政策,政策的本意是褪去行业协会"半官方"色彩,还其民间身份,意在改变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行业协会的积弊。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下发前后,全国各地掀起一股行业协会"脱钩"热潮。据报道,浙江省在2008年2月有1300多家行业协会完成与行政机关的脱钩工作,共有2700多人次的兼职公务员退出行业协会②。但有意思的是,在2006年企业加入协会的比例达到67%的峰值以后,2008、2010年的比例却有回落,加入行业协会的私营企业的比例分别下降到61%和57%。

这些矛盾的现象引发我们对中国行业协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思考,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实践?以往将协会作为一种独立自主的集体行动组织,这难以解释当代中国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机。要揭示企业与中国行业协会的独特关系,必须抛开以往研究中将行业协会自然地假设为一种自主性组织的观点。中国的私营企业与行业协会的关系有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一方面我们关注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的特征:怎样的企业会加入行业协会?另一方面我们关注行业协会职能的特征: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目的是什么?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会认可协会哪些职能?

二、文献回顾

西方社会认为,经济组织和国家,或者经济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整合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的,协会作为经济组织的整合子系统,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5] 协会还被看作是一种减少成本的治理机制[6],利益团体理论则强调行业协会成员身份多样性在政治体系中平衡的作用[7]。

协会的职能在两种不同的体系——多元体系和法团体系——下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在美国和英国这样自愿体系国家,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主要目的是得到特殊的商业服务和参加集体行动,在提供特殊服务的逻辑下,协会必须回应成员的特殊需求,而集体行动逻辑解释了成员合作和参与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中新网,2007年6月6日,http://news.sohu.com/20070606/n250412963.shtml。

② 搜狐网,2008年02月21日,http://news.sohu.com/20080221/n255271492.shtml。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意向[8]。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在规模小的地方性协会中，其成员更认同协会提供的好处或服务，也愿意在一定的成本下采取集体行动[9]174。Nugent和Suliassyan分析了25个国家的几千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跨国检验协会扮演的角色，发现协会帮助了企业减少非正式的费用和少报销售税等，令企业有足够强的动力加入协会[10]。有研究发现行业的集中度、经济规模和工会化对组建集体行动的正式组织有显著的影响，行业的集中度提高，行业协会也更有可能采取政治行动。[11] 在欧洲的奥地利、挪威、瑞典、瑞士等法团主义体系的国家，行业协会则具有重要的政治协商、政策参与和执行的功能，并通过法律和政府认可的正式地位，被赋予“自主管理”“自律”等功能[12]。Bell对澳大利亚的协会研究发现协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甚至扮演了“半政府”的角色[13]。

（一）行业自律的自主性组织

研究者借用了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的观点来解释改革开以来中国的两种代表性行业协会。持公民社会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由市场经济的力量促进形成的自治性行业组织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新兴的利益表达机制，也反映了中国私营企业的集体行动正在形成[14-15]。法团主义理论视角的研究者则注意到当代中国的大多数行业协会产生于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属于“体制内形成”行业协会，承接了政府的某些经济管理职能，并“代表了政府对经济实体干预权的继续延伸”[1,16-17]。一些研究者发现行业协会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集群升级这些功能上的重要作用[18-19]。另一些研究发现行业协会承担了“利益聚合、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或者“参与地方治理”的职能[20-22]。但上述大部分对行业协会的实证研究都是针对浙江温州地区的案例研究。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公民社会视角对自治性行业协会，还是法团主义视角对政府组建的行业协会的研究，都认为协会的自主性和代表性十分重要，而行业协会职能中的协调和自律是最能代表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在这一视角下，本文提出假设：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与行业协会的协调和自律职能正相关。

（二）作为获得资源的行业协会

另一些研究者则质疑传统的行业协会代表性和自治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皮尔森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新经济精英和其所组成的组织由于各种原因对国家形成了新的依赖，这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对私营企业家的预测是相反的[23-24]。首先，从企业的一方而言，由于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把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或者利益共同体只是一种想象，因而不可能有所谓的集体行动[25-27]。持此类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这种依附关系并不是基于个人的，而是与改革开放后权力结构和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党国体制、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等结构性的因素有关，这些原因阻止了横向联盟的形成和企业的集体行动[27-28]。

从行业协会的一方来说，西方的视角认为组织中的国家控制和组织自治的两个功能是冲突的，而研究者指出行业协会在中国历史上就不存在从私人利益的角度与国家对抗[23]117。在中国传统的皇权体制下，行会是国家统治工商业界的重要手段，与西方基尔特的高度自主性、自律性和排他性的商业组织有巨大的差异[29]82。虽然行业协会设立了自愿的、合作过程的正式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上它是被嵌入政府管理结构和过程中的[30]。即使一些持公民社会或者法团主义观点的研究者也指出中国行业协会具有“双重身份”和“半官半民”的性质[3-4]。怀特对萧山地区行业协会的研究发现，协会虽然有一些能影响政策制定或者执行的例子，但并没有扮演“集团行动的组织”的角色，其独立性和影响力都太弱，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们叫做“压力群体”甚至是“利益群体”[14]。蔡欣怡对企业家的调查也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私营企业家采取基于阶级的集体行动，采用维权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是单独行动的，而不是与其他企业家合作[26]113,129。

如果行业协会并没有代表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为什么加入行业协会？怀特的研究发现，首先，面对各级别和种类繁多的协会，企业虽然觉得负担很重，但发现高层次的协会特别是国家级别的行业协会的确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例如容易得到政府支持；其次，对行业协会的负责人的政治激励强化了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附性，与政府官员建立个人的“关系”和建立“关系网”是企业家加入行业协会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重要原因[14]。蔡欣怡发现大企业家成立同业协会的目的“时常是泰然自若地一致与地方官员搞好关系”[26]127。江华的研究也发现行业协会是企业家获取政治利益和社会声誉的重要渠道,行业协会的会长作为统战对象容易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不仅有助于提高社会声誉,还可以获得政府控制的垄断性资源[31]。吕鹏的研究指出工商联的成员身份有助于私营企业主在人大和政协系统中获得席位[32]。贾南甚至指出加入工商联实际可能是伪装的个人政治行动[33]。于晓虹和李姿姿描述了北京市海淀区个体协会受官方影响给协会和企业带来的好处,协会的官民二重性鼓励了个体协会与工商局的密切关系,使协会的负责人“提升行政等级序列的位置”,进而转换为政治资本[34]。

因此,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双重依附关系:企业和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当代私营企业主对行业协会功能的认可和期待与西方行业协会的传统功能不同,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并非寻求协会在集体行动意义上的代表性、自律与协调等职能,而是通过这一途径与政府建立联系或者沟通。因此,本文提出上文的竞争性假设: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可能与行业协会的协调和自律职能无关,而与跟政府建立联系有关。

除了上面这两种竞争性的观点,行业协会提供俱乐部服务的职能并不涉及协会的自主性。与上述文献关注行业协会的自主性不同,另一些实证研究主要从服务性职能来讨论企业加入协会的动机。Duvanova认为行业协会的一些职能看起来更像一个俱乐部而不是纯粹的集体行动,像其他俱乐部产品一样,这种保护是排他性的,其净利益是提高了协会的成员功能[35]。Bennet对自愿体系的英国行业协会的研究发现,企业加入协会的主要动机是提供特殊服务和市场联系[8]。Pyle对三个转型国家的研究显示,协会可以帮助成员降低商业交易费用、保护产权和帮助企业获得信息和市场。[36]协会还可以促进培训、降低信息成本、协调上下游的价值链、促进水平和垂直的合作[37]。提供信息、培训和其他联谊活动等俱乐部服务的职能与行业协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相关度较小,无论在拥有较大自主性的西方行业协会,还是庇护视角下转型国家的行业协会,都为企业提供俱乐部服务等组织资源。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研究选取2006—2010“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从1993年到2014年总共完成了十一次调查。调查的课题组由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等组成。抽样调查由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实施。由于每次调查询问的问题都有不同,2006和2008年的数据比较完善地覆盖了本研究提出的问题,因此可以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2010年有部分问题涉及本研究的主题,只作为描述统计的佐证。2012和2014年的调查没有询问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相关问题。

(二)变量

1. 因变量:行业协会成员身份

是否加入行业协会体现了企业对协会的认可,几乎所有西方或转型国家对协会的定量研究都将协会的成员身份作为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行业协会成员身份的定义为:若企业是行业协会的成员,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2. 自变量:企业对协会的职能的认可

在2006年和2008年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问卷中,询问了私营企业有关行业协会职能的12个问题,问题涉及绝大多数对行业协会研究中提及的职能。

图2显示,2006和2008年私营企业主对行业协会职能认可度最高的5项是一致的,但2008年企业对行业协会的职能的认同比例普遍低于2006年。这5项分别是:“代表本行业企业的共同利益,维护合法权”“帮助企业与政府有关方面增加沟通”“健全行规、行约,加强自律、维护信誉”“协调同行业企业的经营行为”和“提供信息、咨询、教育培训等服务”。中国的私营企业认可度较高的职能与西方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家行业协会的职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会在下文中检验职能认同与加入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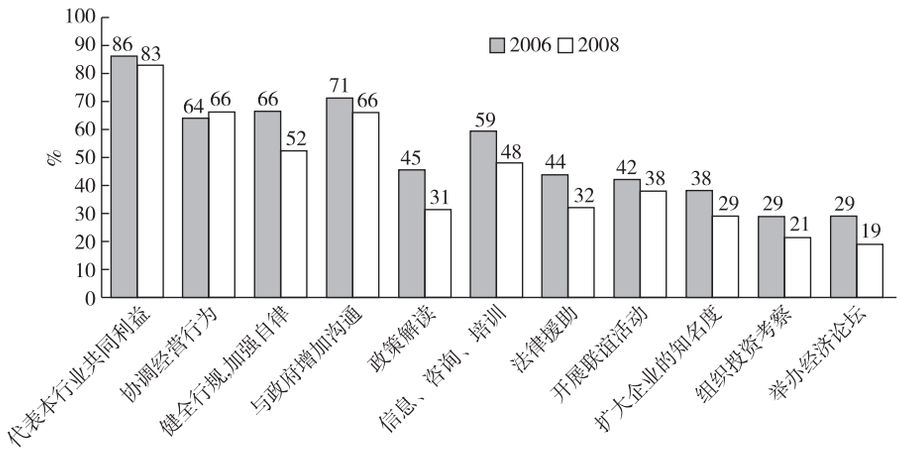


图2　私营企业对行业协会职能的认可

根据以往对行业协会职能的研究，本文将12个有关行业协会职能的选项用聚类分析法做降维处理，减少进入模型中的变量，同时保留行业协会职能的分类（见表1）。选项A比较特殊，在因子分析中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因子，本文将它保留并定义为“代表性”。选项B和C复合成一个因子“协调和自律”，体现了行业协会的自治性。选项D和E复合成一个因子“政治资源”，这与跟政府沟通有关。F到L的选项高度相关，选项代表的是协会的信息、培训服务和其他俱乐部职能，因此复合成一个因子，命名为“俱乐部服务”。数据显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行业协调和自律、与政府沟通，包括部分俱乐部职能，得到了私营企业的高度认可。

表1　私营企业对行业协会职能的认可

职能类型	如果您参加了行业商会或同业公会，您是否希望它们做：	2006 %	2008 %
代表性	A代表本行业企业的共同利益，维护合法权	86	83
协调自律	B协调同行业企业的经营行为	64	66
	C健全行规、行约，加强自律、维护信誉	66	52
政治资源	D帮助企业与政府有关方面增加沟通	71	66
	E提供政策解读的服务	45	31
俱乐部服务	F提供信息、咨询、教育培训等服务	59	48
	G为企业个案提供法律援助	44	32
	I开展企业家联谊活动	42	38
	J扩大企业和企业家的知名度	38	29
	K组织国内外投资考察	29	21
	L举办经济论坛	29	19
	个案数	3056	3622

3. 自变量：企业政治关系

在企业家和企业的各种特征中，本文关注企业政治关联对加入协会的影响。依附理论对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关注，与管理学的公司治理领域对企业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类似。而在中国的转型经济的背景下，不完善的市场和制度环境强烈影响了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动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企业和政府沟通的非正式手段，可以帮助私营企业争取各种资源[38]。有研究发现参与集体政治行动的企业更有可能追求个人的政治行动，集体和私人的政治行动之间的互补关系还会导致“马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太效益”[33]。因此,政治关系所涉及的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是影响中国企业的行动策略的一个重要变量,也会对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行为产生影响。

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通常采用高管的政治背景作为企业政治关系的界定,一般指公司的控股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或与他们有密切联系,或者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或者现任高官[38]。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是获得政治关系的一种重要途径[32]。

本研究用高管在政府曾任职、高管的政治参与两个指标来界定企业政治关系。高管的过往政府官员经历(Poljl)其定义是,高管在开办私营企业前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任职,或者是国有、集体企业中的负责人。高管的政治参与(Polcy)包括高管的人大代表身份或政协委员身份。

4. 控制变量:企业家及企业其他特征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和企业家的教育程度。企业家的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Education):1. 小学;2. 初中;3. 高中、中专;4. 大专;5. 大学;6. 研究生。西方国家的研究证实了行业差异是行业协会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8,37]。本研究主要关注政府的干预的因素,因此只将行业(Industry)作为控制变量,根据在“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19种行业的分类来设定。企业规模以纳税额分组来定义,这是一个类别变量(NSE_{1-3}):1. 小型企业,纳税额<5万RMB;2. 中型企业,纳税额5—110万RMB:3. 大型企业,纳税额>=110万RMB。国有企业改制虚拟变量(Ggaizhi):1为国有改制企业。按企业成立的时间设立新企业变量(New):1. 创立时间在5年内的企业;0. 创立时间5年及以上的企业。

(三)检验模型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构建二分Logit模型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行业协会身份模型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主对行业协会职能的认可变量(Founction),企业主特征的两组企业政治关系变量(Poljl, Polcy),企业规模(NSE_{1-3})、国有改制企业(Ggaizhi)、新企业(New)等企业特征变量。

$$Logit(Join) = \beta_0 + \beta_1 * (Functions) + \beta_2 * (Poljl) + \beta_3 * (Polcy) + \beta_4 * + \beta_5 * (Education) + \beta_6 * (NSE_{1-3}) + \beta_7 * (Ggaizhi) + \beta_8 * (New) + \varepsilon_{ij} \quad (1.1)$$

四、实证结果

表2是Logit模型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是2006年的数据,模型1是基本模型,模型2加入了企业政治关系和行业协会职能认同的变量;模型3是2008年全模型结果。

1. 行业协会的职能与私营企业加入协会

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显示,“政治资源”变量在两年的模型中均为正向显著,说明认可行业协会职能是“与政府沟通”“政策解读”的私营企业家更倾向于加入行业协会。并且,2008年的模型显示,“政治资源”这一变量的系数比其他变量的系数都大,因此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职能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政治资源。

“协调和自律”变量在两年的模型中都不显著,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与认可协会这一职能不相关。在统计描述中我们看到,作为行业协会比较重要的职能,虽然2006和2008年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私营企业家认可“协调经营”和“行业自律”这两项职能,但“协调经营”和“行业自律”并非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主要目的。在2006年问卷中询问企业家是否希望由民营企业家担任工商联会长,有高达65%的宁可选择政府官员兼职或者有政府背景退休的官员任职会长,这表明了至少有半数的企业家并不认为行业组织独立于政府是协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结果还显示信息咨询等“俱乐部服务”的组织资源在2006年为显著正相关,而在2008年为正相关但不显著。虽然描述统计中,企业家认同“俱乐部服务”职能的比例远远小于认同“协调和自律”职能的比例,但模型结果显示,加入了行业协会的企业家更认同协会的“俱乐部服务”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行业协会的“代表性”也得到了加入协会的企业家的认可,但2008年这一变量的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2　政治关系、行业协会职能认同与行业协会成员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		空模型（2006）	模型 2（2006）	模型 3（2008）
企业家特征	政治关联			
	政府经历		−0. 210	0. 208*
	政治参与		0. 605***	0. 977***
	教育程度	0. 178***	0. 153**	0. 081**
企业特征	企业规模			
对照组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0. 365***	0. 240**	0. 521***
	大型企业	1. 101***	0. 780***	0. 946***
	国有改制	0. 277***	0. 342***	0. 564***
	新企业	−0. 510***	−0. 376***	−. 210*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能认同	代表性		0. 411***	0. 333***
	协调自律		0. 116	0. 092
政治资源	俱乐部服务		0. 246***	0. 368***
			0. 265***	0. 056
截距		0. 980***	0. 379*	−. 776***
样本数		3112	3025	2800
模型 chi^2		239	353	554
Pseudo R^2		0. 058	0. 091	0. 151

注：* P< .05; ** P< . 01; *** P< . 001

系数有所降低。这一结论与迪克森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发现协会成员实际上显示了强烈的身份认同[24]76。但“代表和维权”对私营企业主究竟意味着什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从本研究来看，协会的代表性与获得协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显然有不同的意义。

2. 企业政治关联与加入行业协会——互相增强的政治资源

模型 2 和模型 3 都包括政治关联的两组变量和企业规模变量。在企业政治关联的变量中，政治参与在 2006 年模型 2 和 2008 年的模型 3 均为正向显著，政府经历在 2006 年不显著，在 2008 年为正向显著，即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家更倾向于加入行业协会。在企业规模与加入行业协会的关系上，两个模型都显示大型企业加入协会的可能性更高，结果再次支持了企业精英更倾向于加入协会的假设，与蔡欣怡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在以往的研究中，李宏斌等也发现有政治资本的企业家更倾向于参与政治[39]。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精英将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与政府沟通的制度性的途径，没有政治资源的企业却没有利用这一途径的意向。一方面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大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把加入政府背景的行业协会当作对政府组建的管理机构的支持，是企业家与政府在管理和提供资源与服务一种良性互动。

此外，协会方面也因为会费和组织活动的便利而更鼓励和拉拢大型企业。而更可能支持协会的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私营企业家。如怀特在调研中发现知名企业和大企业也受到各行业协会，特别是高级别协会的青睐，萧山地区有部分知名企业是七个以上不同协会的成员[14]。因此，企业政治关联和加入行业协会成为一种互相增强政治关联的循环过程。

五、结论及讨论

研究发现中国新崛起的企业家是政权的支持者，主要原因一是这些企业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利益所得者；其次，吸纳政策也提供了私营企业主融入政党和政治过程的机会，因此，他们不大可能结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成集体联盟或者达成集体行动以对抗国家[23-24]。而行业协会也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这与西方国家和其他转型国家的企业利益聚合的组织都不同。那种认为行业协会去行政化获得更多的独立和自治就可以健康发展的观点可能是不实际的。在当代中国,必须将行业协会角色的探讨置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依附关系的背景之下,这背后的逻辑是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控制,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行业组织,更大限度地获得资源才是生存之道,政府权力保留下的这种依附关系,深刻影响了私营企业对于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及其作用的看法。本文的结果显示,中国的行业协会还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代表企业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而表现出关系资源的特征。

Fan等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更注重实现地方就业等政治目标而非单纯以效率为目标[38]。本文的发现也类似,中国的私营企业的动机和行动是多元化的,以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减少信息成本对中国的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解释并不完整。因此,一方面,我们在实践上观察到中国的行业协会与西方国家行业协会的作用和职能有较大的差距,行业协会并没有成为自主性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其代表私营企业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能力也相当有限,另一方面,这并不妨碍中国的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加入协会的主要目的是与政府沟通、获得信息与政策和其他俱乐部服务。

然而,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对经济资源和市场控制的态度的变化,以及行业协会组织自身结构和职能的完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私营企业对行业协会的态度和期望也会发生变化,行业协会将来是否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私营企业代表及其与政府的连接纽带,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马秋莎. 比较视角下中国合作主义的发展:以经济社团为例[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126-138.

[2] UNGER J. Chinese Association , Civil Society , and State Corporatism : Disputed Terrain.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State: Contested Spaces[M]. New York: M. E Sharpe, Inc.2008,PP1-13.

[3] 康晓光, 韩恒.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5, 1(6):73-89.

[4] 贾西津. 中国公民参与的非政府组织途径分析[J]. 中国非盈利评论, 2007(1):15-33.

[5] 张静. 法团主义:及其与多元主义的主要分歧.[M]. 第2版,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6] MILGROM P, ROBERTS J.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M]. Pre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NJ.1992.

[7] 杜鲁门. 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8] BENNETT, ROBERT J. The Logic of Membership of Sectoral Business Associations[J].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2000, 58(1): 17-42.

[9]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等 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0] NUGENT J B, SUKIASSYAN G.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Firms in Oppressive and Corrupt states: Informality or Formality via Business Associations?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9, 27(4):423-439.

[11] DROPE J M, HANSEN W L. New Evidence for the Theory of Groups: Trade Association Lobbying in Washington, D.C.[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9, 62(2):303-316.

[12] STREECK W, SCHMTTTER P C. From National Corporatism to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Organized Interests in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J]. Politics & Society, 1991, 19(2):133-164.

[13] BELL S.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The Role of Australian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Public Policy[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5, 28(1):25-53.

[14] WHITE G.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J].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3, 29: 63-87.

[15] 王名, 贾西津. 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8):30-43.

[16] 李莉, 陈秀峰. 透析我国官办型公益基金会体制特性及其改革的现实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理论视角[J]. 中国非营利评论, 2009(1):62-78.

[17] 张长东, 顾昕. 从国家法团主义到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行业协会关系的演变[J]. 东岳论丛, 2015, 36(2):5-13.

[18] 黄少卿, 余晖. 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对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较, 2005(4):66-73.

[19] 徐建牛, 孙沛东. 行业协会: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基于对温州烟具协会的案例分析[J]. 浙江学刊, 2009(1):200-205.

[20] 陈剩勇, 魏仲庆. 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个案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03(5):19-26.

[21] 郁建兴,江华,周俊. 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22] 纪莺莺. 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影响力:制度环境与层级分化[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9):65-72.

[23] PEARSON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M].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24] DICKSON B. J.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5] WANK D. The Making of China's Rentier Entrepreneur Elite: State, Clientelism, and Power Conversion, 1978—1995[C]. in Francoise Mengin & Jean-Louis Rocca (eds.) China Moving Frontiers. New York: Macmillan.2002.

[26] 蔡欣怡. 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7] 黄冬娅.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 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J]. 社会, 2014, 34(4):138-164.

[28] 张华. 连接纽带抑或依附工具:转型时期中国行业协会研究文献评述[J]. 社会, 2015, 35(3):221-240.

[29] 徐振国. 中国近现代的"国家"转型和政商关系变迁[M]. 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30] FOSTER K W.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Yantai [J]. China Journal, 2002, 47:41-65.

[31] 江华,张建民. 民间商会的代表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温州行业协会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09, 6(4):78-88.

[32] 吕鹏. 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3(4):154-178.

[33] JIA N. Are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s and private political action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e sector[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2):292-315.

[34] 于晓虹,李姿姿. 当代中国社团官民二重性的制度分析——以北京市海淀区个私协会为个案[J].开放时代,2001(9): 90-96.

[35] DUVANOVA D .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J].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7, 39(4):441-461.

[36] PYLE W.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st-Communist Enterprise: The Economic Logic of Russia's Business Associations[J]. Europe-Asia Studies, 2006, 58(4):491-521.

[37] DONER R F, Ross S B.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y Some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More Than Others [J]. Business & Politics, 2017, 2(3):261-288.

[38] FAN J P H, WONG T J, ZHANG T.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2014, 26(3):85 - 95.

[39] LI H, MENG L, ZHANG J. 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Inquiry, 2006, 44(3):559-578.

(责任编辑　刘　英)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for policy makers on how to popularize financial knowledge, upgrad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provide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borrowing .

(6)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stock marke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world's major stock markets *JIANG Yu* ·53·

Using the data of stock index returns during 2002-201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stock market and other major stock markets in the world by means of time differen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stock market. We h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Due to the long time difference, the impacts of China's stock market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ock marke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mpacts of the former's closing on the latter's opening; (2)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stock market exhibits substantial change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and is by and large increasing; (3) In light of historical events,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other fac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stock market in early years was mainly affected by major events such as financial crisis and debt crisis, while its increase in recent years results fro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ock market.

(7)"Invisible hand" "visible hand" and moving up GVC of service industry: a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TU Nian-song, YI Ze-hua* ·64·

Based on the latest data released by the World Bank,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ountry panel data of 45 OECD countries from 1996 to 2016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arket factors and government factors on the service industry's moving up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We h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Market factors and government factor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bu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 factor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market factors, which reduces the service efficiency; (2) each link of the value chain has different impacts, among which R&D investment and service trade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thus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3) capital and employment hinder th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thus affecting the service efficiency; (4)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arket factors and government factors on service industry upgrading in middle -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8)Narrowing and extens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discretionary benchmark *XIONG Zhang-lin* ·74·

Different from the comparative law, the definition of discretionary benchmark in China is non-normative and non-orientational.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this definition is not adequate.. According to this definition, som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tentative schemes" are often misidentified as qualified ones.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vague criteria for the complicated class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and the ambiguity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system which has proven ineffectiv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of the discretion benchmark should extend to "procedural discretion" but narrow down the aspect of "normative document".

(9)A quantitative study of sexual victim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ZHAO Jun* ·86·

Our regression model indicates that being left behind is not the only risk factor for children' sexual victimization, and the risk for girls is no higher than that for boys. This shows us the way out. Successful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tighten up the community security, intervene in school bullying and school gangs, provide sex education for children, choose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practices, encourage a health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minimize the vulnerability caused by improper punishment and violence, and do not exaggerate the consequence of sexual victimization.

(10)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or accessibility to resources: motiv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joining business association *ZHANG Hua, LÜ Peng* ·97·

Existing studies show that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are ineffective in protecting the interes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Yet survey data suggest tha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seeking membership in business associations. The western theory that autonomy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joining business association doesn't hold water in China.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Survey of China 2006—2010, the paper examines the motiv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ir decisions to join business associat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ir prime motive is to seek access to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such a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club services rather than self-discipline and coordination as the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shows. In this sense, motives of using more resources outweigh those of collective action.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